

文化自觉：中国乡村教育学的生命密码

周 晔 欧阳小宇 董 慧

摘要：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学亟须确立文化主体性，以文化自觉推动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作为中国乡村教育学生命密码的文化自觉，既是对本土和教育双重文化属性的深度体认，也是在现代化语境中确立学科主体性、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追求。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是一个从“自知”到“反思”再到“创建”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涵盖文化觉醒、文化反省、文化传承、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五个关键环节：以觉醒环节的主体身份确认为起点，通过反省环节的价值坐标重构、传承环节的文化根脉守护、融合环节的多元对话拓展，达成创新环节的实践范式革新。实现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一是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夯实学科文化根基；二是对乡土文化进行主体性建构，确立学科本土标识；三是注重城乡文化的双向互融，拓宽学科发展视野；四是开展多元文化的平等互鉴，提升学科国际地位。

关键词：文化自觉；中国乡村教育学；学科发展；乡村教育；生命密码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1-0041-09

教育作为文化的生命载体，既是文化传承的实践方式，也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来源。在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始终与特定文化基因深度互嵌，既从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又通过知识生产与价值传递反哺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深刻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①这一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也为打破教育学本土化研究中“重城市轻乡村”的路径依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乡村教育学是一门植根中国乡村教育实践、聚焦“中国问题”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科，需要注重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寻求理论和实践的突破，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框架。^②在此意义上，文化自觉实乃中国乡村教育学的生命密码，它既指向对自身文化属性的深度体认与创造性转化，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力量。基于此，本研究深入剖析中国乡村教育学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研究”(VHA240006)。

作者简介：周晔，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欧阳小宇，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70)；董慧，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70)。

^①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12-15 (2).

^② 周晔, 徐好好, 刘菊英. 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时代价值、理论问题与建设方略[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2): 31.

化自觉的价值意蕴、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以期为中国乡村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价值澄明

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强调在厘清文化来历、特质与发展趋向的基础上唤醒自主意识，并通过实践实现创新超越。这一理念为审视和解析中国乡村教育学的学科建构与发展脉络提供了独特的认知框架。作为扎根中国乡村大地、承载教育使命的特殊文化实践领域，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既关乎对自身本土、教育双重属性的深度体认，更涉及在现代化浪潮中确立主体性、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追求。

（一）文化自觉及其适切性

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系统阐释“文化自觉”概念，指出“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①这一概念对中国乡村教育学有三层意蕴。其一，文化根脉的溯源与赓续。文化主体需要以“我从何处来”为起点，完成对自身文化基因的解码与承继。这不仅要求中国乡村教育学对本土文化的生成逻辑进行系统性梳理，更需要在“他者文明”的参照下深化对其本土文化独特性的认知，形成以本土为基的主体自觉。其二，文化本真的批判与重构。在“我是谁”的叩问中，文化主体需要直面现代性冲击下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通过辩证扬弃来明确乡村教育的功能定位。这既包含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化，也涵盖对城市化进程中教育异化现象的理性审视，进而实现守正创新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其三，文化进路的规律把握与自主筹划。从“向何处去”的终极追问出发，文化自觉要求主体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三维坐标系中，探索中国乡村教育学的动态演进规律。具体表现为从乡土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提炼教育智慧，立足城乡融合的当下需求重构理论范式，面向文明互鉴的未来趋势设计创新方案。

文化自觉之于中国乡村教育学的适切性，在于其理论内涵与学科特质之间的深切呼应。中国乡村教育学以乡村社会为场域，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色内容，其建设与发展面临“乡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张力。而文化自觉所倡导的“自知之明”“主体性回归”与“文明共处”，为中国乡村教育学理解和应对这些张力提供了实践哲学与方法论指引，使其能够在开放中自主，在对话中创新。文化自觉对于中国乡村教育学而言，实为一场“从自在到自为”的教育哲学革命。它要求学科既要以“显微镜”剖析自身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又要以“望远镜”观测文明交融的历史趋势，进而在“知行合一”中达成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所以，文化自觉并非中国乡村教育学外在的理论工具，而是其内在的生命密码。

（二）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价值意蕴

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作为文化自觉理念在教育学学科的具体体现，其内含三重核心价值。

其一，对学科认同危机的自觉认知。在城镇化与教育标准化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乡村教育学期面临“双重失语”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本土文化被边缘化，致使乡村教育沦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另一方面，学科理论构建过度依赖外部移植，导致主体性迷失。文化自觉的价值，正在于唤醒学科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自知之明”，深刻认识到乡村教育并非落后的“次等形态”，而是承载着农耕文明智慧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独特教育类型。这一认知推动乡村教育学超越“城市中心主义”

^①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195.

的思维定势,实现从“文化自卑”向“主体自觉”的认知跃迁,为学科合法性的确立奠定坚实的认知根基。

其二,对本土文化传承的实践担当。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绝非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深深植根于“教育反哺本土”的现实使命。在本土文化生态加速变迁的当下,其价值在于主动承担好文化传承的责任:通过教育机制将弥散的乡土知识系统化,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文化遗产共同体,并将乡村特有的文化仪式与空间转化为隐性课程资源。此类实践担当,其本质在于通过教育维系乡村社会的“精神脐带”,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断裂,为乡村振兴战略固本培元,留住“文化根魂”^①。

其三,对构建“乡土现代性”教育范式的创新驱动。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也非对现代的被动顺应,而是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中探寻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其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从理论维度上讲,超越二元对立,构建以乡土文化为根基、融合现代理念的本土话语体系;从实践维度上讲,推动课堂、田野、社区立体教育空间的建构,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乡土文化再生;从目标维度上讲,致力于培育兼具乡土情怀与现代素养的“新乡民”,使乡村教育成为孕育“乡土现代性”的孵化器。此种文化自觉的终极旨归,是在全球教育语境中确立中国乡村教育学的独特坐标,既为发展中国家乡村教育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也为人类教育文明的多样性贡献独特的本土智慧。

二、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逻辑机理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并非对自身文化的表层认知,而是一个包含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与自我创建的动态过程。^②其中,自我创建作为文化自觉的实践指向,具体包括文化传承、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三方面。^③由此,文化自觉的完整逻辑链可以概括为五个基本环节:从初始的文化觉醒开启主体意识的萌动,经文化反省实现价值坐标的理性重构,继而通过文化传承守护文化根脉,在文化融合中拓展多元对话空间,最终以文化创新完成时代性的实践转化。这五个环节既彼此衔接又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中国乡村教育学从“自知之明”到“自主创建”的完整进程,成为其存续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 文化觉醒: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

文化自觉以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觉醒为前提,这不仅体现为对学科历史渊源的理性认知,更内含着对学术使命的自觉承担。文化觉醒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知,即主体基于科学理性对自身文化内涵的系统把握。在中国乡村教育学的特定语境中,文化觉醒是指在其发展进程中,能深入把握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并自觉探求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学科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形成的逻辑起点。

一是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性转化。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本土教育实践蕴含丰富的教育智慧,私塾教育提倡“有教无类”至乡约教化推崇“德业相劝”,从农耕技艺依赖的“口传身授”到民间艺术依托的“体验式传承”,诸多传统教育形态共同构筑了乡村教育学的文化基因库。文化觉醒要求乡村教育学以现代学术话语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如将“耕读传家”转化为“实践取向的教育哲

^① 陆益龙,刘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富民: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0.

^②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90.

^③ 肖正德.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自觉[J].教育研究,2024(7):52.

学”，将“尊师重道”重构为“师生共生的伦理关系”，从而使传统智慧成为滋养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学的理论源泉。二是乡村教育本土性的理论建构。乡村教育并非城市教育的“附庸”或简化版本，而是具备独特文化逻辑与实践场域的教育形态。文化觉醒需要直面乡村教育的本土性特征，其教育对象植根乡村社会网络，教育内容紧密关联地方性知识体系，教育过程则依托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整体语境。中国乡村教育学亟须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如“社区参与式课程论”“生态化教学范式”等，以此区别城市教育中盛行的标准化学术中心主义，进而彰显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品格。三是全球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创新。文化觉醒并非文化孤立主义的宣言，而是以主体性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对话。中国乡村教育学应在国际比较教育视野中，既批判性借鉴国际乡村教育经验，又自觉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文化觉醒是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首要环节，不仅要求对传统与本土资源的再发现，更需要借助现代学术语言重构乡村教育的文化身份。这一过程既是“向内看”的文化溯源，又是“向外看”的视野拓展，进而指向中国乡村教育学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主体性确立，并为后续环节奠定坚实的认知基础。

（二）文化反省：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关键基点

在文化自觉的逻辑序列中，文化反省是觉醒之后的关键环节，标志着中国乡村教育学从认知自觉向价值判断的深化。文化自觉的核心在于对自身文化的理性反思与跨文化比较。^① 在理性反思与跨文化比较中，对文化价值进行系统辨析并作出合理抉择。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反省，本质上是立足本土教育现实，对其价值取向、学科定位及现代转型的系统性审视，既是超越现代化迷思的认知机制，也是确立学科独特性的逻辑支撑。

首先，破除学科理论的依附性。当前乡村教育学在理论构建中多沿袭城市化框架，导致理论供给与本土实践之间的结构性脱节。^② 文化反省要求学科主体正视理论移植所带来的“水土不服”，如反思标准化评估对乡村教育多样性的抑制、单一化课程对乡土文化价值的消解，通过批判性比较揭示西方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局限，进而构建基于乡村社会文化脉络的自主理论体系。其次，校准学科定位与使命担当。文化反省需要审视乡村教育学是否陷入“为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发展误区，警惕以城市标准衡量乡村教育成效的错误倾向。通过系统反思学科目标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契合度，明确乡村教育应致力于培养扎根乡土、具备现代素养的新型人才，而非简单复制城市教育模式。再次，激活本土教育的主体性意识。文化反省需要直面乡村教育场域中长期存在的文化失语困境。在外来理论主导的学术话语中，本土经验常被视为被研究对象而非理论生成的源泉。通过深入挖掘村规民约等传统教育智慧，批判性审视专家主导的研究范式，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机制。最后，确立文化自信的价值根基。文化反省的深层旨归在于形成对乡村教育学内在价值的坚定认同。通过系统梳理百年中国乡土教育实践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其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独特功能，进而确立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学科自信，避免陷入自我边缘化的价值困境。

文化反省作为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关键环节，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审视，更在于通过价值判断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这一过程既是向内的自我批判，也是向外的跨文化对话，进而指向中国乡村教育学作为价值引领型学科的使命定位，为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转型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① 姜家生，束庆波. 文化自觉何以可能的时代考量 [J]. 学术界，2013（7）：93.

^② 侯怀银，原左晔. 乡村振兴呼唤乡村教育学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2）：53.

（三）文化传承：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固本之基

文化主体在确立文化觉醒的认知基础并完成深刻反思后，必然演进至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建构阶段。这一过程涵盖文化传承、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三个维度，其中，文化传承为文化建构的基础。文化传承的本质是文化主体通过代际传递与现实转化，使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并焕发生机，其前提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深度认同。文化认同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对所属文化价值的理性接纳、精神符号的情感依归与行为规范的自觉践行，既是文化传承持续进行的认知基础，也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它不仅塑造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更通过文化血脉的延续机制，将分散的文化符号整合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从而为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双向赋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化认同为文化传承奠定合法性基础。只有当文化主体将特定文化内化为自我认知的组成部分，形成文化归属的自觉意识，文化传承才能超越形式化的符号传递，转化为蕴含情感共鸣与实践动力的文化实践。另一方面，文化传承通过实践过程强化文化认同。当乡村教育将本土文化转化为课程资源、教学场景与实践活动时，学习者在亲历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断重构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进而形成文化身份的再确认。这种认同与传承的循环互动，使中国乡村教育学既保持文化根脉的连续性，又获得面向现代的文化韧性。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活的基因库”，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精神密码与伦理智慧，是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固本之源与传承之基。它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传统技艺、村落格局与自然景观，也涵盖精神层面的民间信仰、乡规民约与价值观念。这些文化要素不仅是乡村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更是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教育理论体系的资源宝库。因此，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传承必须立足乡土文化的当代转化^①，既要通过教育实践激发乡村儿童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共鸣，也要以现代性视角审视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探索其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国家战略的契合点。唯有如此，中国乡村教育学方能突破“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范式，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开辟一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现代化路径。

（四）文化融合：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开放格局

在文化自觉的演进过程中，文化融合是继文化传承之后的必然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乡村教育学从“文化守护”向“多元共生”的格局转型。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若仅囿于对本土传统的固守，难免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既需要扎根本土文明的精神土壤，更需要以开放姿态吸纳多元文化资源，在对话与互鉴中拓宽学术视野与实践场域。文化从来不是孤立静止的实体，而是在持续交流中保持生机。不同教育思潮的碰撞、实践模式的比较、价值理念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教育学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

文化自觉的开放性，要求在对本土传统保持应有尊重的同时，通过“他者”视角积极借鉴全球教育发展的多元路径。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融合，绝非简单拼贴异质文化元素，而是通过批判性对话实现创造性转化。既要警惕以“现代性”之名片面否定本土传统，也要避免以坚守“本土性”为由简单排斥国际教育经验。这种开放格局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学术生态。文化融合的实现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始终立足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实问题，以自主立场审慎吸纳外来文化；二是差异性原则，尊重城乡文化、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差异，在多元并存中探寻教育理论的生长点；三是创造性原则，通过教育实验与田野研究，将外来教育智慧转化为解决中国乡村教育问题的本土方案。在此过程中，

^① 彭泽平，许乐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图景、挑战与方略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5 (2): 68-77.

需要警惕两种偏颇倾向：一是将文化融合曲解为教育西方化，以外来理论简单裁剪中国实践；二是将开放格局窄化为教育元素的拼接，忽视文化整合的系统性。真正的文化融合，是在保持核心文化基因的同时实现形态创新，既守护本土教育的根基，又通过异质文化因子的引入激发“新质”。这种开放格局下的文化自觉，指向构建“和而不同”的中国乡村教育学知识体系，使其既能在全球教育对话中彰显中国特色，又能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教育文明。通过文化融合，中国乡村教育学得以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型。

（五）文化创新：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动力源泉

在文化自觉的逻辑演进中，文化创新作为主体性建构的最后环节，承担着将理论自觉转化为实践变革的关键使命。文化自觉的根本目标，是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型与自主创新。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并非对现有教育体系的局部调整，而是基于本土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教育理念、制度安排与实践方法等要素进行系统性重构，从而为文化自觉的持续深化提供不竭动力。

文化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乡土特质的乡村教育新范式。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中国乡村教育学亟须回答好“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既要传承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又要培养能够适应并引领现代乡村发展的新型人才。这要求乡村教育创新必须超越简单移植外部模式的发展路径，真正立足本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建构”的范式转变。这种创新不是对城市教育经验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体系提供独特路径。文化创新的深层价值，在于培育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乡村教育生态。长期以来，乡村教育发展多依赖外部输入，内生创新动力不足。^①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创新，强调激发教育系统内部的创造活力，通过提升教师、学生、乡民等主体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使乡村教育成为文化再生产与知识创新的实践场域。当创新深度融入到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文化自觉便实现了从认知层面向实践层面的根本转变，推动中国乡村教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贡献中国智慧的深刻转变。

作为文化自觉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践转化的关键枢纽，文化创新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现代性的盲目追随，而是在文化传承与融合的基础上，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创造性发展。缺乏文化创新的自觉是不完整的，它将难以应对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挑战。因此，文化创新不仅是文化自觉进程的动力源泉，更是中国乡村教育学保持生命力、形成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机制。乡村教育只有在持续不断的创新实践中，才能真正传承文化血脉，培育文化自信，推动社会进步。

三、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自觉的实现路径

文化自觉的达成绝非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根植学科实践的系统性工程。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以扎根本土、观照传统、对话现代、面向世界为核心逻辑，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城乡文化的双向互融和多元文化的平等互鉴，构建内生性成长、主体性确立、开放性发展的完整路径，进而实现学科价值与时代使命的统一。

（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夯实学科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智慧，是中国乡村教育学文化基因的核心载体。中国乡村教育学的

^① 周晔，董慧，欧阳小宇. 教育强国建设中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公共性缺失与复归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5 (1): 92.

文化自觉，首先需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式传承，既守护其精神内核，又赋予其现代学术表达与实践形态，避免陷入固守传统或全盘西化的二元误区。

其一，挖掘传统乡土教育智慧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社会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如耕读传家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的实践方法、乡约教化的德育模式以及私塾教育中知行合一的教学传统等，均为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富矿。学科需要以历史考据与理论阐释为工具，系统梳理传统本土教育的思想谱系，如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乡约精神提炼为乡村共同体德育理论，将农闲授业、农忙实践的教学安排转化为季节性实践课程范式，使传统智慧成为学科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

其二，构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话语转化机制。文化自觉要求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壁垒，避免传统文化沦为标本式的静态陈列。从学科话语层面看，需要将尊师重道重构为师生共生的伦理关系理论，将家国同构的教育观转化为乡村教育的家国情怀培育框架；从实践层面看，推动传统教育元素的课程化表达，如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乡土诗词文赋，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阐释孝亲敬老的现代内涵，在劳动教育中传承勤耕不辍的职业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目标的内在契合。

其三，推动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创新。学科需要引导乡村学校建立理论、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传承体系。在课程开发上，设计传统技艺进校园、乡土文化研学等项目式课程，如组织学生参与传统农具制作、民俗礼仪传承等实践；在教学方法上，融合数字化手段，通过VR技术复原传统农耕场景、制作非遗文化数字档案，增强传统文化的可感知性；在评价维度上，构建“知识掌握+技能习得+价值认同”的多元评价标准，避免传统文化教育流于形式。

（二）乡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确立学科本土标识

乡土性是乡村教育学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定，也是其文化自觉的核心锚点。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打破“城市中心主义”对乡土文化的遮蔽，通过对乡土文化的价值重估、资源开发与体系建构，确立学科的本土性学术品格。

首先，构建乡土化课程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乡村教育课程的“去乡土化”导致学科理论与实践脱节^①，文化自觉要求扭转这一困境。学科需要牵头构建“国家课程本土化、地方课程特色化、校本课程生活化”的三级课程理论框架。在国家课程实施中，引导教师挖掘学科知识的乡土关联，如在数学教学中融入农田丈量的几何应用，在科学课程中探究本地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在地方课程开发中，系统整合区域乡土资源，如将西南地区的吊脚楼建筑转化为建筑学启蒙内容，将西北民歌融入音乐课程；在校本课程建设中，鼓励学校基于自身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形成“一校一品”的乡土课程生态。

其次，挖掘乡土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乡土文化并非落后的地方性知识，而是蕴含独特教育智慧的文化宝库。中国乡村教育学需要建立“乡土知识—学术理论”的转化机制。一方面，研究者要深入田野，开展参与式观察、口述研究等，将村规民约中的教育规范、口传心授的技艺传承经验等提炼、升华为富有生命力的学术命题。另一方面，要构建乡土教育资源数据库，系统收录地方历史沿革、民俗风情、传统技艺、自然生态等资料，为学科研究提供实证支撑。例如，针对江南水乡的“水乡教育文化”、陕北高原的“黄土教育智慧”开展专题研究，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成果。

最后，培育乡土文化传承的共同体。文化自觉的落地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学科需要推动构建研究者、教师、乡民、学生的乡土文化传承共同体。通过设立乡土文化工作站，邀请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开展乡土文化研学工坊，组织师生共同参与族谱修订、民俗

^① 周晔，董慧，欧阳小宇. 转向身心一体：乡村学校乡土课程的具身回归[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22）：53.

调查等实践活动；建立乡土文化传承评价机制，将学生的乡土文化认知与实践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形成“人人参与传承、人人守护文化”的学科实践生态。

（三）城乡文化的双向互融，拓宽学科发展视野

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绝非乡土本位的狭隘坚守，而是在打破城乡二元对立中实现文化的双向滋养。学科建设需要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原则，既吸纳城市教育的先进理念，又输出乡村教育的独特价值，构建城乡教育共生的学术体系。

首先，批判性吸纳城市教育的现代要素。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反对乡村教育内容的城市取向，立足乡村，扎根乡村，办服务乡村的教育。^① 城市教育在数字化教学、课程标准化建设、核心素养培育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可为乡村教育学提供养分，但需要避免简单移植导致的“水土不服”。学科需建立理念筛选、语境适配、实践改造的吸纳机制。在数字化教育领域，将城市的智慧教学平台改造为乡土数字化教学系统，融入本地农业技术、民俗文化等数字资源。在课程设计方面，借鉴项目式学习理念，开发乡村振兴主题项目，如乡土产业品牌设计、乡村生态保护方案等。在师资培养上，引入城市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结合乡村教学实际构建田野式教研体系，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其次，推动乡土教育智慧的城市反哺。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打破乡村单向吸纳城市文化的失衡格局，主动彰显乡土教育的独特价值。学科可牵头畅通城乡教育对话渠道，组织乡村教师向城市分享田野教学、劳动教育等实践经验；开发城乡融合课程资源包，将乡村的农耕文化、生态智慧转化为城市学生的研学内容，如城市学校的农耕体验课程、乡土文化研学营等；开展城乡合作研究项目，共同探讨教育公平、文化多样性等共性议题，使乡土教育智慧成为推动城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资源。^②

最后，构建城乡协作的学科研究生态。文化互融的深化依赖学术研究的协同推进。中国乡村教育学需要建立高校、城乡学校的跨区域研究联盟，围绕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路径等课题开展联合攻关；设立城乡教育互融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开展跨区域教学实践与研究；创办城乡教育对话学术专栏，刊发兼具乡土特色与现代视野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城乡教育文化的深度交融与理论生发。

（四）多元文化的平等互鉴，提升学科国际地位

在全球教育语境下，中国乡村教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以“本土为根、全球为镜”，在平等对话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避免陷入“文化孤立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学科需要构建“以我为主、平等互鉴”的开放体系^③，确立中国乡村教育学的国际学术坐标。

首先，以本土性锚定国际互鉴的根基。多元文化互鉴的前提是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中国乡村教育学需要以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性为出发点，系统提炼具有本土标识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框架，如基于家国同构的乡村教育共同体理论，基于农耕文明的生态教育范式等。唯有立足本土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才能在国际对话中具备不可替代性，避免成为西方教育理论的“注释者”。

其次，以批判性思维吸纳国际乡村教育经验。国际乡村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日本“乡村振兴教育计划”中“地域共生”的教育理念，芬兰“现象教学”中对乡土资源的运用，印度“非正规教育”中对地方知识的重视等。中国乡村教育学需要建立国际经验本土化改造的分析框架，

^① 王聪颖. 平教会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的历史意义 [J]. 教育史研究, 2023 (3): 69.

^② 周晔, 董慧. 1949年以来我国城乡教育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时代使命: 兼论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必然逻辑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 92-93.

^③ 杨明全, 赵瑶. 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5 (4): 14-23.

从制度适配性、文化兼容性、实践可行性三个维度进行筛选与转化。例如，借鉴日本“地域教育振兴法”的思路，结合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乡村教育与地域发展联动机制。参考“芬兰现象”教学模式，开发以乡土问题为核心的主题课程，实现国际经验的创造性转化。

最后，推动中国乡村教育理论的国际传播。文化自觉的终极追求之一是实现自身文化价值的国际共享。中国乡村教育学需要搭建国际学术传播平台，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合作研究等渠道，系统阐释中国乡村教育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如晏阳初“平民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现代价值，以及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教育创新实践；培养跨文化乡村教育研究人才，支持学者参与国际乡村教育流程研究，提升中国乡村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打造中国乡土教育国际品牌，如建设国际乡村教育研学基地、开展跨境乡村教育合作项目等，使中国乡村教育智慧可感知、有影响、能共享，为全球乡村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 李 卯）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ife Code of Chinese Rural Pedagogy

Zhou Ye, Ouyang Xiaoyu, Dong Hu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rural pedagogy needs to determine cultural subjectivity, us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promot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s life code of Chinese rural educati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 cultural attributes of local life and education, and a practical pursuit of establishing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and achiev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The consciousness has undergone a dynamic evolution from self-awareness to reflection and then to creation. This process encompasses the stages of cultural awakening, reflection, inheritanc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starting with the confirmation of subject identity in the awakening stage, reconstructing value coordinates in the reflection stage, safeguarding cultural roots in the inheritance stage, expanding multidimensional dialogue in the integration stage, and reaching practical paradigm innovation in the innovation stage. To achieve the consciousn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duct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establish local identity for the discipline, emphasize the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s and broaden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nd carry out mutual learning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enhance the discipline'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rural pedagogy;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rural education; life code